

目 录

封面题字：杨 超

关于川西南十七州市县文史资料工作协作会议的情况

——罗国栋同志在天全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扩大）上的传达

..... (1)

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提高质量，让文史资料工作更好地为社会
主义建设服务

——高明星同志在川西南十七州市县文史资料工作协作会

议上的发言..... (3)

近现代人物

记高仕荣.....胡锡彭 (6)

高子泉其人.....王宗明 刘永杰 (9)

任画匠的巧技.....刘怀玉 (10)

马维馨和四川省立国术校.....二匀 (11)

回忆天全公园.....胡正伦 李家甫 (12)

建国前的天全邮政.....刘美章 (14)

天全解放前的自卫结构.....胡正伦 (16)

李元享进天全县城目睹记.....何永福 (16)

袍哥“叙荣乐”.....高子华 (19)

天全酱油.....刘怀玉 (20)

史海拾零

- 旧县政府人员参加办“神会”胡正伦 (21)
- 地方事务,不用考虑军衔.....胡正伦 (21)
- 教师考试.....胡正伦 (22)
- 向传义躲飞机.....王永熙 (22)

辛亥革命记事

- 天全同志会喋血雅安城.....罗开基 (23)
- 天全州官入袍哥.....罗开基 (26)
- 始阳明代高土司墓初考.....刘永杰 (28)
- 掌故轶闻——“迎春”刘怀玉 (30)

关于川西南十七州 市县文史资料工作协作会议的情况

——罗国栋同志在天全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扩大）会上的传达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向大家传达川西南十七州市县文史资料工作协作会议第二次年会的精神。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首先汇报一下会议概况

《协作会议》第二次年会是1987年9月22日至26日在凉山州西昌市隆重召开的。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原协作单位的雅安、甘孜、凉山、西昌、汉源、石棉、荣经、名山、芦山、宝兴、天全等地政协的代表外，还有新增的攀枝花、乐山、米易、盐边、康定、泸定两市四县政协的代表。凉山州和西昌市的宣传、统战、地志、党史、档案等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凉山日报》的记者应邀参加了会议；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和《四川政协报》文史版编辑同志专程到会指导。

这次会议是在我省各地政协全面传达贯彻全国政协第五次、四川省政协第三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的形势下召开的。本次会议根据《协作会议》雅安第一次年会的决定，由凉山州、西昌市共同主持。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探讨文史资料工作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问题；研究加强横向联系，密切文史资料协作等有关事项。其目的在于加强本片区包括新增单位在内的十七个州、市、县文史资料工作的协作，探索文史资料工作的新路子，开创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

这次会议自始至终受到了凉山州和西昌市四大班子的关怀、支持和帮助。会议开始和结束时，凉山州和西昌市四大班子的领导均拨冗参加，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李朝浦同志在讲话中用“以史为镜，可以照兴衰，知得失”的道理，阐明了搞好文史工作的重要意义，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让大家在西昌过得愉快，会议还安排了参观我国闻名于世的卫星发射基地，及西昌的邛海，全国独一无二的奴隶社会博物馆。使到会同志领略了西昌得天独厚的大好风光和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无限情趣。

二、会议交流的主要经验

会议期间，各地政协代表发言踊跃，气氛热烈。会上共宣读了十四篇论文和发言材料。我县政协副主席高明星代表政协天全县文史工作委员会作了《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提高质量，

让文史资料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发言。会上交流的经验，主要是在新形势下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一步克服“左”的影响，搞好业务建设，充分发挥文史资料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四化”、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作用等方面的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作了初步探讨，取得了新的进展。同时，具体交流了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核实、编辑、出版、发行和加强调查研究，做好“抢救”工作等方面的经验。我想就我们要着重学习的文史资料要为两个文明建设和巩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服务方面的经验作一些汇报。

1. 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雅安市政协编辑出版的四辑文史资料《选辑》中，工商经济“三亲”资料有十二篇，占总篇数的24%。其中三篇南路边茶史料，记述了边茶沿革、生产、制造、销售以及消长变化概况、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和宋、明、清、民国时期政府管理边茶的措施等内容，受到省、地茶叶部门的重视，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资料。有一篇边茶史料是民建、工商联六十年代时搜集整理的，1984年以这篇史料为基础，进行了一次边茶专题调查，提出了改革现行管理、经营体制的建议，在全国杭州茶叶咨询会议上部份建议被写入会议报告，为国务院采纳，交有关部门办理。

《雅安文史资料选辑》还具有地方特色和强烈的感染力，引起雅安市各行各业和各方面人士的关注。有的学校教师采用《选辑》部分内容，作为阐述原理实例，编写了政治、语文、历史、地理课的教材；有的选择部分史料作为乡土教材；有的中专学校邀请文史资料撰稿人到学校作新旧社会、新旧教育对比的报告，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四有”教育；雅安川剧团新编川剧《走向光明》剧本，是大量选用文史资料的记述，广泛征求史料撰写者、知情人的意见，反复修改而编写、演出的。特别是1986年底有的城市出现少数大学生闹事后，在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教育中，雅安的大学、中专、中学和部份厂矿企业，选用了《选辑》中的史料，对学生、职工进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四有”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2. 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服务

甘孜州政协从州的实际情况出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①从伟大的祖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全国藏族地区都是祖国神圣领土，用大量的史实说明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藏族归属祖国的历史是长期以来藏族人民总结历史经验而做出的正确抉择，是各族人民共同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藏族人民对缔造和发展多民族的统一祖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②从藏族的历史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历史上一系列进步的演变，都是和中华民族整体的变革分不开的。藏族人民同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了密切不可分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形成了具有强大内聚力的团结基础，从而促成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他们用史实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

③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统治的压迫剥削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威胁着各族人民生存和发展，共同的命运促进了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共同进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以解放以来甘

甘孜州藏族人民充分享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祖国各族人民建立了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社会主义新型的民族关系，以历史和现实无数事实说明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他们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激发了甘孜州各族人民更加热爱社会主义。

米易县政协在《文史资料功能浅说》的发言中，讲了文史资料是促进广泛联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的作用。他们列举了谭嗣同的孙子谭训聪在台湾供职，曾撰写《谭嗣同年谱》一书，因远隔海峡，无力校勘、订正脱稿。至1980年他弥留之际，托友人把未竟书稿辗转带回大陆的妻子刘萍君处。1985年刘收到书稿以后即表示“要完成训聪的遗愿，让炎黄子孙继承先贤遗志，振兴中华，以慰亡灵”。于是不顾年事已高，三返桑梓浏阳，历时三个春秋，这海峡两岸的谭氏后代终于完成了《谭嗣同年谱》撰写。由此观之，一篇史料，牵动海峡两岸有关亲人的心略尽绵薄，并引起强烈反响，从一个小小侧面可促进“一国两制”和台湾回归祖国大业的实现。

会上省政协文史办主任李吾洲同志介绍了全国第五次、全省第三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的基本情况，并围绕全国文史工作会议的报告和纪要谈了体会，着重强调了进一步打好基础，突出特点，加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问题。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近年来各地的文史资料工作是有进步、有成绩的。同时还指出，加强文史资料工作的横向联系，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互通信息、拾遗补缺、交流经验、互相促进的好形式。最后经过协商完成了第二次年会纪要，确定了第三次年会，由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主办，并定于1988年8月在康定召开。

总结经验教训， 努力提高质量，让文史 资料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高明星同志在川西南十七州市县文史资料工作协作会议的发言

我代表政协天全文史工作委员会，作一简要汇报。

(一)

我们政协是一九八四年初建立的，今年三月才换成第二届，成立得比较迟。我们政协一经建立后，在安排部署全面工作时，就把文史工作列为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设置了政协文史组，并由一位副主席和秘书长兼管，政协党组和政协主席都亲自过问这项工作，亲自

撰写和审查修改稿件，文史组承担搜集、征稿组稿、编辑、付印和内部交流等工作。这项工作一开始，适逢省召开文史资料工作会，我们就边学边干，本着以“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资料为主，结合我县的实际情况，立足本县，面向全地区和邻近有关兄弟县，进行广征博采和抓重点相结合的原则，在编辑中尽量做到具体、翔实、生动、努力提高质量，三年多来，共出刊了《天全文史资料》六期（上届出五期，本届出一期）共计67篇，18万多字。其中近代史料29篇，占总数的43%（主要是辛亥革命到建国初期的重大事件、人物和西康起义的前前后后。因我县是老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时过境两次，在全县建立过苏维埃政权，这方面资料占了8篇）；天全古史9篇，主要是过去缺乏这方面的史实记载，县志是清咸丰版，叙述简略，配合方志工作，在征集的九篇中基本上说明了我县的历代建置沿革和重大变化；有关经济方面的四篇，着重以茶叶发展史为主；有关文教卫生交通、财税、邮电、金融方面的13篇；地方风物方面的10篇；其他2篇。每期资料除分发、报送有关单位和政协委员外，并分送省内各兄弟县，共印500份左右。由于我们编辑水平低，政策性不强，因而反映在质量上不高。其中近代革命斗争史虽占到百分之四十以上，但反映经济建设方面的只有4篇，作为文史资料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则是相当不够的。尚有待于今后的大力加强。

（二）

在三年多的文史资料工作中，我们边干边改进，在工作中也有一些体会。大体上可分组稿和提高质量两个方面：

在组稿当中，我们强调“三亲资料”，要求具体、翔实生动和实事求是，是怎么回事就怎样写，不搞个人褒贬，具体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具体分析，用六中全会决议精神来衡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文史资料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方法上，一是召开各种会议时，会后加一课，当场动员，提出要求，进行组织，落实到人，必须贯彻有利于爱国主义，对于人民后代都有利；二是同有关部门联系，发掘重大题材，如同县委党史办、县志办和民主党派协商，组织某几件大事的稿件有关长征、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前地下党和民主党派从事革命斗争的稿件，就是这样组织来的；三是重点抢救，专题访问，主要是针对一些知情或亲自参加过某一活动的老人，实行登门拜访，取得资料；四是围绕某一件大事，请知情人在一起共同回忆和商讨，每次解决一个问题；五是拟定几个专题，召开有关人员会议座谈，在座谈会上安排题目，会后加强走访，促使完稿；六是依靠参加政协的各单位在职的同志，明确任务，请他们代为组稿。如有关邮政、文教、经济、地方风物、交通等方面的稿件，就是这样征集的；七是下乡深入调查研究和访问，这一条做了，但做得相当不够，组稿对象以县城和场镇的工作做得最多，对下乡组稿的问题，今后应努力改进和加强。同时在组稿中，我们也遇到不少问题。如有些老人，由于受左的影响提供资料不大胆、不动笔写有顾虑，除了正面宣传，打消各种顾虑外，在抄录、笔书等方面的困难要加以解决，最后采用的稿件，我们都发了润笔费。

在提高质量方面，我们已编的六期文史资料，可以说质量都不太高，但我们也有一些肤浅的认识和体会。要提高质量，就要解决“尚实”的问题，即崇尚真实。汉代曹丕就提出过“铭谏尚实”。在近现代，周总理、邓颖超、李维汉等同志多次强调过这个问题。在历史上

的事情，错的就是错，对的就是对，要按它的本来面目来写。无论过去现在和今后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的大屠杀，铁证如山，近年来日本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写出企图抹煞这一屠杀事件的文章，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我们强调“三亲”，但还不是绝对可靠，还要深入探讨。如“亲历”是亲身经历，但也不是绝对可靠，如看问题的角度和深度，就最容易带片面性。亲见亲闻更有许多不可靠的因素。所以核实史料是关键，必须严肃认真、忠于历史、忠于真理、忠于事实，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尊者讳，不溢美，不贬损。并同时把好政治关和文字关，质量就会逐步提高。

(三)

再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进一步加强横向联系的问题，我们在工作中也深深感到横向联系的重要。如我们这些地区在撤消西康省以前属西康省，好些历史事件是互为联系和影响的。如刘文辉起义的史实，当时刘重点在雅安，张为炯代省主席驻康定，伍培英等驻西昌。西康起义前后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斗争十分激烈，好些事件不可能在一个地方搞清。又如解放前地下党和民主党派的同志，冒着白色恐怖的严重风险，在甘、雅、凉地区工作，好多事件是互有联系的。马识途的《西昌行》虽是小说，确是以当时地下党在雅安、西昌的斗争的背景写出的。上溯到清代和清以前，也有不少重大史实是互有关联的，远如诸葛亮的南征，忽必烈的南征大理，刘、王、郝三王族的兴衰，近如辛亥革命和军阀割据，特别是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光辉业绩等，都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这一切都说明搞协作，搞横向联系，互通情报，交流资料，包括共同探讨一些重大史实是完全必要的，去年第一次协作会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四)

我们搞文史资料工作必须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求实存真撰写“三亲”史实，就是立足于昨天，着力于今天，有利于明天，所以我们应以科学的方法反思昨天，把握今天，开拓明天，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文史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研究，探索创造与改革相适应的现代化气氛和文化心理环境，促使精神文明建设从一种外部规范转化为人们自觉的内在精神要求。加强文史研究，使文史为现实服务，以实现其历史科学的社会职能。这是历史科学发展的大趋势。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因此，我编纂的文史资料，就应该有助于提高人的素质，对后代有利，发挥它应有的教育作用。

另外，通过撰写文史资料，可以把不同出身、不同社会经历、不同职业、不同信仰的各方面人士团结起来，启发大家热爱祖国，热爱乡土，调动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积极作用，撰写文史资料是我们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让我们共同努力，进一步搞好文史工作，以充分发挥文史资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记高仕荣

胡锡彭

高仕荣，别名伟华、欣伯、德鑫，1912年生，天全县始阳镇人。是我县近现代知名人物之一。

高父名云鹏，字程九，前清岁贡，为人忠厚勤朴，以教书、行医为业。中年家境殷实，晚年受时局影响衰败。

生四子。仕荣行三。

高仕荣幼年憨厚笃实，智不过人。6岁开始读私塾，18岁（1930年）始入始阳县立高级小学。父亲曾谓其“天性笨拙，难以造就，徒耗时光和金钱。”1932年高小毕业后，嘱其务农。高仕荣却崇尚教书，有志以教立身，常言“智不过人，勤可补拙”。为了能继续读书，他四处求亲托友，婉劝其父，方得就读雅联立中学。

升学初中以后，他倍加发奋刻苦，每期都名列前茅，获得奖学金。1935年初中毕业后，家庭经济困难，他四处奔走，欲谋一小学教员为业，苦无人事关系而不得。后经联中教导和班主任的帮助，获校长苏法成允准：照穷苦优秀学生规定，免交学杂、伙食费升本校高中。仅一年时间，学校经费困难，师资不齐，缺课太多，1936年秋偕同班同学张浓充，考入实行公费的成都省立师范学校。

其时，正值大后方掀起了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高潮。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对日经济绝交，要求川军出川抗战。高仕荣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尤其是他目睹震动全省的“大川饭店事件”，更加激起了民族仇恨，使他毅然投身抗日救亡的浪潮，参加了书写、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出壁报、集会、游行示威、唱歌、演剧等抗日救亡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结识了进步同学郭永江、彭塞、刘定等人，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壑不知地之厚也。及至蓉城，方知我中华精英荟萃，英杰倍出。……刻下当局腐败，外夷逞强，我中华五千年文化遭蹂躏，八千里河山被践踏，七尺男儿，岂能苟安……。”当年10月，经郭永江介绍加入了车耀先发起成立的进步团体“中苏文化友好协会成都分会”，11月又加入李亚群等同志主编的《战时学生旬刊》和《星芒社》，并被聘为编辑，撰写和编辑过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声讨汪精卫降日叛国，抨击妥协投降的汉奸理论的文章。

“七·七事变”后，党中央派邹风平、廖志高、于江震来四川会同罗仕文、张耀时恢复和重建四川地方党组织，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委。在党的领导下，四川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民主力量迅速壮大，党的组织也得到很快恢复和发展。原来秘密建立的抗日团体先后公开活动，一些新的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四川各地迅速建立。1937年10月，由郭永江介绍，高仕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8月，国民党四川省党部通令全川，禁止人民群众组织任何抗日救亡团体集会游行，宣布战时图书审查法。接着查封了《大声周刊》和《星芒报》等进步刊物。成都省立师范学校一些特务、国民党学生，打击迫害参加抗日救亡的进步师生，高仕荣同其他地下党员一起，争取校方和有影响的正义教师、社会力量，保护进步师生。同时组织学生，以支持和欢送川军出川抗战为由，继续宣传抗日。

1939年秋，高仕荣由成都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同郭永江、张浓充等党员学生一起，考入国立四川大学。时任四川大学校长程天放，在学校残酷迫害地下党，实行跟踪监视，密捕等白色恐怖，破坏地下党组织。1940年3月，国民党特务预谋制造了成都“抢米事件”，四川地下党领导人罗仕文、车耀先被逮捕。党组织决定有关人员尽快疏散。同班同学郭永江、张浓充、刘定等先后转学。1941年春，党小组长尹志骥暴露身份，组织决定其秘密转移，临行前传达组织的决定：（1）立即解散党小组，停止组织活动；（2）凡已受到监视、转学也成问题的党员，立即离开学校；（3）没有被怀疑的留校，必要时打入国民党，掩护自己，掌握敌情。并指示高仕荣留校，可能时加入国民党。根据组织的决定，高仕荣于是年秋加入了国民党，并一直同地下党员彭塞、牟文元、罗英等人保持联系。1945年，罗英、彭塞、牟文元先后秘密转移，高遂与组织失去联系。

1943年秋，高仕荣于四川大学教育系毕业后，由系主任邓只淳推荐到西康省政府教育厅任中教股长，兼办《西康国民教育》月刊。他厌恶官场中勾心斗角，觉得学生纯真可爱，主要在省立师范和边疆师范任教，住宿在城外学校中，无事不进城，常同校长刘仁选、兰悦忠一起研讨学问。

1945年2月，天全县长李林力辞其天全中学校长兼职，通过省教厅向理润调高仕荣接任。在工作中，他利用天全中学是李林创办的条件，积极为学校争取经费，去成都聘请教师，得到课程开设和教学方法的自主权。学校办得很有起色，受到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同年10月，县长李林为牵制县参议会中的派别活动，平衡地方势力，便利用高仕荣在教育界的影响，及其在天全涉政不深的条件，派县政府秘书兰葆初（高的川大同学），多次动员其同李家楷竞选副议长，经兰葆初、李旭光等的活动，以21票对20票当选副议长。同时又补为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三青团县团部干事。高仕荣进入县参议会后，同王去非、李家楷、欧阳历光、高平阶、邱芝山等议员一起，争取对教育和地方公益事业的支持，抨击政弊，揭露不法行为。如田粮主任高国藩贪污黄谷三千余石，参议会审议时，有些议员主张只按三分之一价赔偿。高仕荣等坚决反对，力主全数追赔；1946年元月李元亨攻城劫监后，议会审议李元亨抢劫粮库数处，损失黄谷一千多石案，有议员主张如数核销，高又会同主持正义的议员进行调查，确认李元亨并未抢劫粮库，所报损失黄谷纯属趁混水摸鱼的贪污案，要求追查。另有一名二十四军排长，因赌博、吸毒，常在街头巷尾暗劫单人行商，苛索百姓甚至暗地勾引天中学生组织袍哥“英雄社”，横行社会，欺压学生，威胁教师。高以副议长身份吁请县长苏法成查办，县政府将此人捕杀，为社会除了一害。同时，高在学校开除了三名流氓学生，维护了学校秩序，保障了师生安全。

高仕荣的行为引起了参议会一些议员和地方势力的不满。1946年秋，青年党人王昭文任天全县长，伙同排斥高，其手段是：（一）以省参议会“公职人员不得兼任参议会职务”的

规定，使其退出参议会；（二）削减天全中学预算；（三）扣发天全中学预算内经费；（四）指使兵痞流氓对高寻衅闹事并企图暗害。1947年2月，县长王昭文以“批准长假”之名，迫高离开了天全中学。

高仕荣离开天全中学后，由川大老师刘绍禹介绍到西康政府教育厅任视导员，不久改任康属督学。在职期间，曾多次跋涉康属各县，调查教育状况，草拟了《振兴发展康属国民教育实施方案》，但未得当局采纳。1948年10月，高调任雅属督学，曾多次往返成（都）、雅（安）寻找党组织，未能取得联系，心情十分苦闷。又值当时社会经济崩溃，货币不断贬值，物价继续飞涨，生活十分困难。一月的薪金不足维持一人十天吃饭。他只好半月在雅安应付公务，半月在始阳同家人一起艰难度日。在家期间，他经常阅读《新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等全国性报纸，了解全国形势，希望能找到党组织。

1949年2月，经省教育厅同意，高仕荣与谭福祥对调，接任了省立始阳师范学校校长职务。当时，解放战争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蒋介石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急欲控制西康，搞垮刘文辉，为蒋介石最后退入西康作垂死挣扎创造条件，派其亲信国民党特务来康，勾结地方势力，企图再度掀起倒刘风潮，制造混乱。始阳镇的国民党骨干、特务和一些地方武装势力，互相呼应，散布反共言论，扬言要抵抗解放军，与党国共存亡。他们对始阳师范早欲控制，因时局变化，不便公开下手，只在学校中安插和欺骗少数国民党、三青团学生，搞些小麻烦。高系当地人，接任校长后，他们认为有机可乘。先是同高攀亲叙故，继又结为“金兰”，后要在学校安插人员。高仕荣虚与周旋，婉言拒绝，引起了不满，骂高“不识抬举”。开学后不久，社会谣言盛传：“高仕荣把持教育”、“高仕荣贪污经费”等等。接着，趁高公差离校之机，制造了“饭不够吃”的学生闹事事件。高在主持正义的师生支持下，组织师生代表查账，公开经费账目，向全校师生和社会人士说明“饭不够吃”的事实真相，挫败了反动势力的阴谋，平息了事件。

不久，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国民党加紧对四川实行暴力统治。通令全川实行戒严，在成都宣布宵禁，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西康，刘文辉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采取针锋相对，加紧对地方势力的策反工作，积极准备阻击国民党西窜，相机举行起义。成、渝各地不少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疏散来康，配合刘文辉开展工作。6月，在荣经县工作的民盟成员赵锡华（高的川大同学）写信给高仕荣，告诉“将有一批‘同学’来到始师，他们都是优秀教师，可以信赖，望予妥善安置。”同时，按照赵的嘱咐，高去雅安会见了彭迪先、张志和等民盟负责人，接受了安置、掩护一批地下工作人员的任务。7月，原川东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罗英写信给高，介绍其同刘文辉的机要秘书（地下党成都市委统战工委书记）胡立民联系。高去雅向胡陈述了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汇报了思想和工作，提出了恢复组织关系的请求。不久，罗英来雅安，向胡立民谈了高仕荣入党和失去组织联系的问题，胡向组织报告后，通知高同地下党天全支部书记罗文清接头，罗代表党组织同高谈话后，向川东地下党负责人杨正南请示，经杨批准，恢复了高仕荣的中共党员组织关系。并向高传达了当时党的指示。暑期，刘文远、罗文清、唐绍虞、王雪瑶、黄仲实、陈为珍（均为地下党员）、苏济质（地下团员）、尹志纯、刘复慧（民盟成员）等先后来到始阳师范。他们在学校组织学习政治时事，宣传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教唱《山那边的好地方》等歌曲，高仕荣、刘文远还同一些地方武装头目取得了联系，为策反做了一定

的工作。9月，经党组织同意，由刘文远介绍，高仕荣加入了民盟，化名高德盛。

11月上旬，人民解放军二野主力从川湖公路入川，月底解放了重庆。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和雅安通电起义，西康宣告和平解放。10日，蒋介石由成都仓惶飞往台湾。始阳师范高仕荣等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组织学生张贴、散发迎接放军的标语、传单，宣传解放军布告。高仕荣还整理了平时收集的地方武装力量及政治倾向等资料，准备提供给人民解放军。

1950年元月，天全解放后，高即加入了地方工作队，参加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8月，调雅安专员公署任教育科科长。9月，中共西康区党委纪委批准停止了高仕荣党籍。1953年春调任西康省干部文化学校副校长。同年，雅安成立民盟区分部，被选为主任委员。1956年3月，调雅安第一中学任副校长至1975年退休。1980年于雅安病故，终年68岁。

高仕荣在担任雅安一中副校长期间，坚持教学、写教案。他晚年患严重肺气肿哮喘，行动十分困难，仍每天提着小黑板为学生上课。

1984年8月，中共雅安地委组织部通知：“撤销停止高仕荣同志党籍的决定，重新恢复党籍，党龄从1937年10月起计算。”

高子泉其人

王宗明 刘永杰

高子泉，天全县始阳镇人，自号和川野叟，生平好学，于文学颇有造诣，人称高先生。

先生早年于刘盛昌商店当学徒，不久因受虐待而离去，至合川县任职员，兼学校教习。

民国十五年（1926年）子泉与同乡人胡莹甫相偕赴泸州，参与刘伯承将军所领导之泸顺起义，经第三路司令袁其衡保荐，子泉受委为上尉服务员，胡为参议。

后泸州被围攻，刘伯承将军采纳群议，就小河方面布并电网，安设探照灯以防敌军渡河。其时，子泉奉命监管布防，引借电灯公司电力以成电网，用张明清电影院电机，镜头以成探照灯，配合聂秋涵营据守沿河要点，战守五十余日，敌累犯皆败。

当部队退却时，子泉又是奉命掩护，全军未撤完不得摘除探照灯。由于敌已渡河，子泉左手负伤，旋即潜往张明清电影院得免。”

以后，先生还乡，常被当局见疑，不得已伪装哑，缄口不语达二十余年。

当时在场镇水浩头背后，高子泉自建一白色斗室，长约丈余，宽不过七、八尺，并题其名为“省心庐”。庐室中设几、榻，书并座右铭：

“内不欺良心。外不欺古人。”

“明不欺天地。暗不欺鬼神。”

子泉平日洁身自好，攻读史籍，外出时则随身携带小黑板及粉笔小布兜，逢有人与其交谈，先生或颌首，或用粉笔书字对答。乡人有造访者，或求诗、求对，不无应允。

民国三十四年，诗友江蕴波先生曾赋诗一首：

“男儿何必事英雄，意气平陵到底空。

世上争名夺利辈，都付风云瞬息中。”

以请教子泉先生，先生与其韵亦和诗一首：

光舜事功未是雄，浮生点滴过名空。

如何克尽“三良”业，万化都归“天载”中。

（注：“三良”指良心、良知、良能；“天载”见《四书》《中庸》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一九四五年，始阳师范附小庆祝四月四日儿童节，请子泉先生撰对联一副，其文为：

小子虽无知，却能此日受化雨。

后生实可畏，遥想当年乘东风。

某年春节，地方人士高植槐，亦请子泉写对联，其联云：

“不管写白字、写黑字，总是写字。

须知过阳年，过阴年，横顺过年。”

子泉先生后来立志研究王阳明、陆九渊有关哲学著作，自己亦著有《良心学》第一、二集文稿，现不存。

一九四九年冬，天全解放，子泉先生开口说话，并积极参加农民协会，担任文书工作，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上书刘伯承将军，书中首陈昔年泸州战事，回首往事。继叙现况，并表示：“子泉精力尚未衰朽，拟候地方土改结束，即赴渝听候驱策，尽瘁余生。……”

同年五月二十八日，西康省人民政府转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来函，指出高子泉曾参加泸州起义，当地政府应予以照顾，查明后情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上报省民政厅等。由是高子泉受到政府的优待和照顾。土改结束，子泉调至始阳区畜牧兽医站工作，直到一九六〇年四月不幸病故。

任画匠的巧技

刘怀玉

提起民国年间的任画匠，凡带点年岁的天全人，谁都知道他心灵手巧。画、紫、裱、塑、雕、剪、漆等艺技，他无一不会。在天全县，虽不算首屈一指，但我幼时对他的目睹耳闻，至今想来，还觉值得怀念。特择几点记之。

画。花卉翎毛，山水人物他都会。他的壁画，我见过城头城隍庙后殿壁上的“贪”，那可是型大、笔工、且富有“戒”意之作。壁高约十米，宽约三十米，在其中央，他画出了一轮红日高照，下有一只形如麒麟但无独角的巨兽。它正反颈举头，张着血盆大口，獠牙毕露，双眼圆睁，鼓着眼球狠盯日头，状欲吞吃。而空中太阳，从薄云中折射出的万道金光，似利箭，若锋刃，直逼其兽。令人望而戒意生：贪得无厌，必类此兽，定然落得活活曝死于

烈日之下的。故人们呼此壁画为“贪”。

紮。纸人马，牌坊彩楼，狮子龙灯，风筝灯笼，他样样都能。单举两点，是我幼时叹为观止的。一是“迎会”时，平台、高台中的“龙、凤、鹤、鹿”，他紮在每付高肩背架子上。化了装的人物骑着，沿街游来，丝毫不露是人背着在走的痕迹，只让人觉得逼真。二是阴历五月二十八的城隍会，他给庙前的过厅（今城厢一小校门至茶厂围墙五、六丈远之地，高十几丈，宽可容纳千多人的木瓦结构的过厅，紮了一盏大如斗篷的荷花灯，高悬厅空。荷灯八方分三层，各伸出一横竿，悬挂着状似四季花卉、水类的鱼、鳖、蝦、蟹和空中飞禽之类的小巧灯笼。晚间唱夜戏，大小灯笼全亮了，神采夺目，妙不可言。

裱。他的裱工，我耳闻过一桩待考颇值一索的事情。听说，余书平任天全县长前，曾是某团长驻防天全的团部秘书。他从高顺武的书房中，看到一堂屏，即开口索取。高不答应，就被诬为通匪，要定罪。逼得高逃到甘杠子躲避日久。后，余任天全县长，高的屏仍被夺走了，高只得徒唤奈何。为啥此屏这般坑良民害百姓呢？原来，高是从任画匠手买到的。而任画匠又是给人（不详其人了）作裱时，既识货又有巧技才弄到的。因为，屏上的字，是一位不知何方人民的书法家，手指甲饱蘸松墨写在双宣纸上的。双宣，是两层薄如蝉翼合而为一的书画专用纸，纸一着墨，其汁即浸透两层。任画匠巧取其底层，裱为已有。这，唯有慧眼独具，且备绝技的人，方能巧取得到的。任画匠后以苦于生活，不得已才售与了高家的。这个“听说”近乎“神”了，但不妨的，待我有机会时，拜访一下高的后裔高然，再另补笔证之。但，任画匠确有一定的艺技是不可讳言的。因此，任画匠之名反超过了任松廷之本名。这在我那时的心中，他既是能工巧匠，又是为人慈善的一位长者。旧社会，他靠手艺吃饭，供家养口，却还接济不如他的人，王某某之妻，曾得同情，解放后，1970年，惊闻任老去世，嚎啕痛惜。任老终身七十三岁，享受到县修缮队的全资安葬，这是他九泉下足会含笑的。

马维馨和四川省立国术专门学校

二 勾

马维馨（马德宏字）1929年在军阀杨森的授意和刘文辉的支持下，在成都开办了“四川省国术馆”。地址在半边桥街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后门。随即又成立了“四川省立国术专门学校”，招生授徒。马自任馆长兼校长。馆方邀请了成都有名的拳术家和有声望的武术爱好者以及部分绅耆和军政界人物成立董事会，刘自乾（刘文辉字）任董事长；校方聘请胡杰（始阳人）为学监。其实，马维馨本人并不会武术，他之所以担任斯事，无非是当时赋闲在家，在省当权的旧僚友替他安置的“人情官位”罢了。学校事务，全交胡杰负责。聘请了十几位负有盛名的拳术家作教师，这些教师，大都地位颇高，有前清武举，武秀才、和部队武术教官。课程不学文科，除大部分时间学武术外，也学军事学。武术课分门别类，拳、剑、刀、枪、戟、矛、弓……几乎十八般武器齐全。但教学兵器除教师本人用“真家伙”外，学生用的，全是木制品，值得赞美的是教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所以学生成绩（功夫）进步

较快。学生全部住校，实行军事管理，在“强身强种，卫国保家”的口号下，却也招收了不少青年（入学不经过考试，大都是推荐的）。1929年，第一期开学，1930年续招第二期。我是第二期由胡杰介绍入学的，同我入学的天全青年，还有县城的杨潜和马志骥，始阳的黄占奎、田馨泉、胡品超。1931年又招第三期，始阳徐和协也进了校。马维馨当时家住成都廉官公所街，不常到校，所以一般学生对他印象不深，但我们却是同乡，关系当然不同，每逢星期或节假日，大都要去“马公馆”看望校长，其实，“看望”的目的，无非是想吃顿“油大”或搓四圈“麻将”。有时马校长一高兴，还奖给大家“春熙大舞台”的堂厢戏票。

国术馆每年二月花会期间，照例举行武术比赛（当时叫“抬擂”）。地点在青羊宫花会场。用“淘汰制”选拔优秀者，奖品分四种，都发奖章，一等金章一名，颇似前清考状元；二等银章三名；三等砧蓝铜章（称蓝章）三十名；四等镀金铜章（称特别章，此种特别章，实际上是表演奖，并不比赛的），比赛一般很精彩，每对比赛，裁判员必须判出取胜者的招法、拳路的名称，使战败者和观众心服口服和斗鹌鹑一样。但有几条规定比较严肃：不准用暗器伤人；战败者已经退出线外，不得穷追，更不得给对方“挂红”（即打出血），谓之“武德为先”。比赛射箭，也讲“射以观德”。1930年，第二届比赛，我们学校的学员李可谟，以短打获金章奖，特别章五名，由学校侯万里老师和八十高龄的杨老师首先登台表演“单刀破矛”；继由李教官表演“法化刀”；最后是我和17岁的冯蜀霞（冯老师女公子）表演双舞剑和对打，这是馆方特意安排的老、中、青示范表演。1931年，第三届擂台赛，荣经孙耀武以力大取胜获金章，始阳徐和协也取得一枚蓝章。

1931年秋，马维馨另有高就，国术馆也因经费拮据，日渐消沉，省立国术专门学校也只办了两年半，1931年底，在川局形势紧张中停办。我县几名学生，学得半途而废。

回忆天全公园

李家甫 胡正伦

天全公园在县城之南，即现在的汽车站、物资局、县医院、人武部、煤建公司等一带地方，面积约在四十市亩以上。修建时系拆卸东岳庙、火神庙、两座庙宇后挖掘附近的乱坟荒土，利用旧料、添新补旧而成。其创建人为驻军营长李烈辉，民国十六年（1927）戍守天全，利用兵工拆庙挖土，其大量神像泥屑，以及挖高填低的余土，堆积约一百米长、三十米宽、十多米高的土丘，称之为假山地形基本上掘平以后，规划游览干道和支道，劈小径蜿蜒而上假山，并临时在苦蒿山一带挖来许多不知名的野草闲花，遍植于假山及干道两旁。雏形初具，游人不少。

民国十九年（1928）驻军移防，张骏以团长兼县长戍守天全，即将“演武厅”、“道子头”（较场坝）划入公园范围，扩建有“高台”、“横架”、“秋千”、“沙坑”等，并在入场门口，竖简易木通牌坊，由营长黄惠之书写兰底白色“公共体育场”五个大字。

一九三〇年，天全为屯殖部戍区，县长余宗钰重视地方教育、建设，对天全公园大加扩

建，大体可分以下几个方面：

甲、基本建设

1. 利用城墙石墩，修建进口，通往体育场大道，并在道右建约二米高的石墩围墙，园西进口处用石墩砌为鼓楼式进门。

2. 折小南街口“送子宫”、“龙王庙”，划入公园地界。

3. 加宽干道、支道，铺盖青沙路面，便于雨后游览。

4. 假山之东，挖掘围园约三十米的荷花池。绿池边安装憩息石墩，后因水原缺乏而干涸。

5. 挖池所掘之土，分别加高在假山上。在假山北端，竖有石柱，上书红漆字：“你忘了天津条约吗？”、“你忘了南京条约吗？”、“你忘了马关条约吗？”、“你忘了辛丑条约吗”？游人至此，有识者为之深思。

6. 将演武厅改修为三间敞房，接收私立永慎图书馆并改为天全图书馆，内容一新，对外开放。

7. 天全河水蜿蜒如带，绕公园自西而东，沿河边的丘陵高地，建一连三间、一楼一底的楼阁一座，命名“烟雨楼”。楼上有一联：“临水建高楼，听梧桐滴雨，雨滴苍苔，人道是石家金谷，隔溪入画境，看杨柳笼烟，烟笼茅舍，我疑为晋代桃源。”楼的四周则绿柳垂簷，飞来椅上，坐卧自如。在此西望禁门，东望龙尾，使游人心旷神怡。楼有茶馆，天全毛尖，品茗七盃，两腋生风，回味之余犹觉身历其间。

8. 楼之东北修建平房三间，题名“醉月”。县人张凤五开餐馆于此，拿手名菜“鱿鱼炒面”、“锅炸”，色香味俱佳，餐者莫不啧啧称道。

9. 从南进门之右，建一厅房，窗格均为余字形，地板亦刨平油漆，工作较细致，以后改为天全民众教育馆，随后又为国民党天全县党部占有。

10. 新做木条双人椅一百把，分别摆在各室及干道两旁，供游人憩息。

11. 原“东岳庙”大殿，房料结实，结构牢固，未予拆毁。东岳神像，垂帘相隔，殿门有联兰底白字，文曰：“不似俗人偏信鬼，愿从民意仍尊神。”不知何时，神像也捣毁了。一九四三年三青团天全筹备处在此建立。

乙、栽培花木

1. 由县府拨大洋三百元，派建设科吴达到成都专买花木。与此同时，又另拨教育经费派学区委员陈和春去买儿童图书及体育用品，派教育局庶务高光璧同去管钱。

2. 由成都买回的花木，草本多，木本少。草本方面有各形各色的绿竹蝴蝶，各式各样的菊花等，名目繁多，难以记述。比较稀奇的有“车前草”（像白菜一大窝）含羞草等。木本有杨柳、千丈、梧桐等。几年之后，夹道成荫。暮春初夏，百鸟争喧，蔚为幽雅之所。

3. 县城黄铜坡街杨家花园，为前清京官“员外郎”杨氏故园，奇花名树不少，因家道衰落，无力照管，听其荒芜。县府派人协商，以半征半购方式全部搬入公园。其中直径一米大的花盆、盆景就有一百个。其它如各种颜色的梅花如“绿萼”，以及“宫春”罗汉松等不下数十株。这一增补，为园内增色不少。公园经过逐年增补，一年四季，万紫千红，争奇斗

艳，给游人以美的享受。

整个公园，由李烈辉草创，张骏继之，余宗钰扩而大之，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天全公路不通，地方偏僻，能有如此小小公园，农隙工暇，前往一游，沁脾解闷，良有以也。有七绝一首：“隔江眺望沙坝村，烟景宜人草木森，慈朗钟声惊晓雾，乐溪渔舟唱晚晴。”回忆及此，濡笔记之。

建国前的天全邮政

刘美章

天全自唐宋以来，唐设和川镇兵，宋改衙门砦，元设茶马司，明置太平驿。历来皆有驿马。改设后，西北二道皆设置。故无驿站。

乾隆元年，奉文为请设川省之铺司等事，额设铺递四：在城底铺东十里，至碓臼溪铺十五里，至始阳镇铺东二十里至多功铺，设铺司兵八名，每名岁支工食银六两，共银四十八两。

天全邮政机构的建立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七日，撤铺递，设置天全邮政代办所。代办人罗锦荣，地址“恒发”店内。（现解放街二轻工业供销公司门市）。民国十年（公元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升为三等邮政局。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二月一日，改升为三等乙级邮政局（西川邮政管理局通令四四九号）。民国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又升为三等甲级邮政局（西川邮政管理局通知第九一三号）。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迁居于陕西馆（现天全中学内）。后又迁至徐剑侯房内（现天全县招待所），至一九五〇年二月解放移交。

一九〇二年设置的邮政代办所，是委办机构，开办的业务：对外只受理一般平常信函。民国十年升设为三等邮政局后，是自办机构。设置邮差六人，信差（投递）一人，听差一人，局长一人，共计九人。开设有营业室，对外受理业务有：平信、平快、单挂号、双挂号、特别快信、保险信、航空信、明信片、新闻纸、印刷物、书籍、贸易契、商务清单、货样、诉讼文书、包裹、汇兑、代收货款等业务。到民国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邮差增至十二人，全局共计十五人。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信差增至二人，局人共计十六名。至一九五〇年二月解放时未变。

乡镇邮政分支机构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统计有：
邮政代办所：始阳镇（民国六年设）、响水溪二个。

邮政信柜有：新场、十八道水、灵关、双河场、保胜场、公议场、太平场、大川、两路口、紫石关、铜头场、水獭坪、思经坝、风吹林。十四个。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统计有：增设南坝子、长河坝、安乐村邮政代办所。紫石关、思经坝由邮政信柜升为邮政代办所。飞仙关邮政代办所由天全管辖。民国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增设小仁烟邮政代办所。民国三十七年（公元一九四八年），两路口升为邮亭为自办机构。马世钧任邮亭管理员。

邮 路 司 邮 递

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年），成都设立邮政局，开始筹组成都—→雅州（雅安）—→打箭炉（康定）邮路，即成康干线邮路。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正式组成邮运。全长三百多公里。当时成雅段为逐日昼夜兼程班，雅康段为月班。民国十年天全设局后，天雅段为逐日昼夜兼程班。民国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雅康段由月班改为逐日昼夜兼程班。这时天全邮政局邮差六人增至十二人，担负天泸段的逐日昼夜兼程班。途中要经过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门坎山、马鞍山两座雪山。民国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十月，川康公路的二郎山路段竣工，邮运改沿公路翻越二郎山至泸定。

天全邮政局，从民国十年升设邮政局起，就担负着从雅安经天全至泸定一百五十七公里的干线邮运。这段邮路是成康干线道路最艰险难行，全赖人力背负沟通的邮路。地处高原，山岳连绵，峰峦起伏，山高路险。夏秋山洪暴发，冬令大雪封山。邮工背负着沉重的邮件，沿着茶道，翻越着丛山峻岭。成年累月，日日夜夜跋涉在崎岖的深山峡谷，悬崖陡峭，急流险滩之中。稍有不慎，即有粉身碎骨之险。历尽着千辛万苦。如：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一日，邮差运送成康第一七九号排单邮件，在小仁烟与两路口之间的两河口，过蔑索桥时，行至桥中心，桥断人袋落水。

从天全经始阳镇、飞仙关到雅安，下午七、八点钟，又背负着六、七十斤重的邮件，提着四方马灯，连夜从雅安返程。途中须经河流湍急，洪水汹涌的宋春渡、飞仙关两个舟渡，稍一疏忽即有灭顶之灾。翻越虎子岗、梅子顶两座山，黎明时回抵天全。

天泸段邮运比天雅段更艰险，沿途都是山峦起伏，河流纵横，深沟峡谷，荒山野林，荆棘丛生，豺狼豹凶猛野兽常出没的地方。从天全到泸定，途中须过六座铁索桥，十七道小桥，二十道独险桥。还须吊攀数道溜柯子，翻越虎豹经常伤人的竹岗山、门坎山以及常年积雪的马鞍山三座大山。邮差工数十年如一日，耿耿忠诚地维持着邮运的畅通。正如当年英国驻成都领事，在给其上司的报告中说：“四川邮差备尝万苦千辛，忠诚服务，具有卓然可观之成绩。虽其服务地方，盗匪充斥，军队纵横，仍仆仆道途，冒险不顾，且能饱尝兵匪等之鞭笞虐待。假若忠诚毅力稍为薄弱者当之，岂能奋勇好事，而不偷生者耶。”又如，四川省交通志邮电篇载说：“成都——雅州（雅安）——打箭炉（康定）邮运干线，是省内具有历史意义的邮差干线。曾在四川邮运上起过重要作用……。”

天全邮政局的邮政工人，除担负着成康干线的雅泸段邮运外，还邮递着三条支线邮路：

第一条：从天全经思经坝、新场、新添站至荃经六十六公里的间日班邮路。

第二条：从天全经十八道水、老场、铜头场、芦山邮政代办所、太平、大川等间日班邮路。

第三条：从天全经十八道水、灵关、宝兴至懋功一百一十公里长的间日班邮路。